

越文化研究丛书

王建华 主编



YUEDI MINSU  
WENHUA LUN

# 越地民俗文化论

寿永明 宋浩成 俞婉君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越文化研究丛书

王建华 主编



YUEDI MINSU  
WENHUA LUN

# 越地民俗文化论

寿永明 宋浩成 俞婉君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吕 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地民俗文化论/寿永明 宋浩成 俞婉君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01-009078-8

I. ①越… II. ①寿… III. ①风俗习惯史—研究—浙江省  
IV. ①K892.4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3803 号

## 越地民俗文化论

YUEDI MINSU WENHUA LUN

寿永明 宋浩成 俞婉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25

字数:262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078-8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越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学勤 陈伯海 陈桥驿 高丙中  
董乃斌 董楚平 章培恒 葛剑雄

主 编 王建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建华 叶 岗 权锡焕 朱志勇  
寿永明 李生校 张炎兴 周一农  
费君清 高利华 梁 涌 陶 侃  
章 融 谢一彪 潘承玉



# 前言

王建华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华民族在其长期奋斗的过程中,既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化,又形成了主要因地域差异所造成的地域文化。

谈地域文化,必须做三个区分:文化核心区、文化基本区、文化边界区。文化核心区是文化发源地,也是此文化最为集中的区域;文化基本区是此文化相对比较稳定的区域;文化边界区是此文化影响曾达到过但比较弱的区域。

文化核心区当然是最重要的,因此,首先要做的,是确定文化核心区。我们现在说的地域文化,其名多取自周代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早在秦统一中国时就陆续消亡了,因此,这种国名实际上只是一个历史名词。显然,楚文化、越文化、吴文化都不等于楚国的文化、越国的文化、吴国的文化。不过,也毋庸置疑,以周代诸侯国取名的地域文化与原诸侯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原诸侯国所创造的文化是该地域文化之源。因此,一般将古诸侯国的疆域划定为该地域文化的



核心区。

问题是,古诸侯国的疆域是变化的,越国在灭吴称霸后,不仅据有现在的浙江全境,还拥有江苏、江西、安徽、山东之一部,其都城也一度北移至山东境内。显然,根据越国强盛时的疆域来划定越文化的核心区是不妥当的。

就越文化的实际来看,我们认为,将越文化的核心区划在以绍兴为中心的方圆一百公里左右的地区是比较妥当的。这块地区,亦称“越中”。绍兴,原名会稽,大禹时立的名,秦统一中国后,设会稽为郡,唐改会稽郡为越州,南宋绍兴元年,高宗南渡,驻跸龙山,命改州为府,冠以年号,即为绍兴。元、明、清三代均称绍兴(路、府)。关于绍兴府的范围,在清代,“属邑八: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东至宁波府慈溪县界,西至杭州府钱塘县界,南至金华府义乌县界,北至大海,东南至台州府天台县界,西南至杭州府富阳县界,西北至杭州府钱塘县界,东北至宁波府慈溪县界。濒海之邑凡五: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是也;濒浙江之邑一,萧山是也”<sup>①</sup>。

越文化的基本区是古越国领土比较稳定的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浙江省。浙江省因浙江(今名钱塘江)而得名。古越国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浙江流域。《越绝书》载:“越王句践与吴战于浙江之上。”<sup>②</sup>又说,越王句践兵败后与大夫文种、范蠡去吴宫为奴,“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sup>③</sup>。又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楚威王兴后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越文化的边界区是越文化基本区周围的地区,它曾属于古越国的版图,也曾属于其他诸侯国的版图。值得指出的是,文化中的区域概念与行政中的区域概念是不同的,前者只是大致上的,其边界是交融的,模糊的;而后者是明确的,其边界则是清楚的。因此,即使我们将越文化的核心区确定在今绍兴地区,越文化的基本区确定在今浙江省地区,也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越文化的历史可追溯到大禹。据《史记·夏本纪》:“禹会诸侯江南,计

① 吴梅堂:《越中杂识·越中图识》。

② 袁康、吴平:《越绝书·勾践入臣外传第七》。

③ 同上。

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大禹死后传位子启，夏朝开始。据史载：“启使使以岁时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庙于南山之上。”<sup>①</sup>此是越的开始。不过，此时的越，虽有了大禹的宗庙，尚只是地，不是国，据《吴越春秋》：“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sup>②</sup>少康封无余于越，意味着越有了自己的地方政权。无余是越国的第一位君主。无余传世十多代后，因“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转从众庶为编户之民，禹祀断绝”<sup>③</sup>。十几年后，有奇人出，自称是无余之后，指着天空，向着禹墓，说着鸟语，立志要“复禹墓之祀，为民请福于天，以通鬼神之道”<sup>④</sup>。顿时，凤凰翔集，万民喜悦。大禹之祭恢复，越国开始强大。

大禹是中国古代全民族共同尊崇的帝王，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的实际奠基人。越文化源于禹，说明越文化不只是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诸多地域文化之一支，而且是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直接继承者。

在地域文化中，越文化是有着鲜明特色的，比如名士辈出，清人吴梅堂《越中杂识·越中图识》用了八个字概括越文化的特点：“风景常新，英贤辈出。”关于“英贤”，吴梅堂《越中杂识序》说：“守斯土者，皆辅相之才；生斯土者，多菁华之彦。”毛泽东有诗咏越，诗云：“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虽然中国大地到处都出人才，但人才出得多、档次高、历代不中断，形成一种名士文化现象的，大概只有越了。

又如文武兼融。从越文化源头古越国历史事迹看，它是尚武的，后人概括其精神为胆剑精神，胆剑精神之剑，意味着勇猛进击。这种尚武的精神，发展为革命的精神，在近代反清革命中表现得鲜明突出。虽然越文化中有尚武的一面，但是越文化更多地表现出来的却是重文，此地出的文人多，在儒学、佛学、玄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再比如道器并重。道学代表人物明有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承前启后，脉系分明；实学是道学之外别一种学术<sup>⑤</sup>，此派重经世致用，古越有范

① 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将陈亮与叶适说成是“道学外的思想家”，见该书第56章。

蠡、文种、计倪，重农倡商，开其先河，南宋有陈亮、叶适开宗创派。从而充分见出越文化道器并重的特色。

研究越文化，最早始于东汉，代表性事件是袁康、吴平整理《越绝书》。《越绝书》是越人在越世系断绝以后虑越史之绝而撰写的一部地方史书，袁康、吴平整理此书，增加了当时流传的于越故事，补充了先秦以后的资料，所以他们的工作属于早期的越文化研究。从袁、吴的工作联系到东汉初期，这实在是越人流散以后越文化研究的发端时期，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时期。从现存成果来看，除《越绝书》之外，还有《吴越春秋》和《论衡》两种。从保存越文化资料的价值来看，《越绝书》无疑是首要的，但《吴越春秋》和《论衡》的价值也都远远超过先秦人的著作。<sup>①</sup>其后，这种研究没有间断过，但没有出现标志性的成果。

越文化研究的跃进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轫的，当时出现了一批思想活跃、见识宽广、根底扎实、治学勤奋的史学家，他们既深入钻研古代有关越人的大量文献，又细致地鉴别分析这些文献，先后提出了不少前无古人的科学创见。如顾颉刚、罗香林、卫聚贤、蒙文通、杨向奎诸氏，都发表过关于越文化的不同于前人见解的论文。80年代以来，越文化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研究队伍空前扩大，研究成果，包括专著和论文，大量涌现。同时借助于考古的发现，多学科交叉综合的研究也大量出现，获得了大量的成果。

一如越文化是一条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有关越文化的研究也是个没有尽头的学术之路。

我们认为，今后越文化研究需注意以下三点：一、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的结合，越文化是历史形态，但其发展则为现实形态。对越文化，我们不能只做历史的研究，也应做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且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要注重从越文化的历史形态中发掘出更多的对当代有价值的启示。二、单项研究与整体研究的结合。在单项研究上，我们过去做得比较多，整体研究相对较弱。三、多角度地研究。文化，本就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总和，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应是多角度的，目前我们的越文化研究，角度还不够丰富。

<sup>①</sup> 参见陈桥驿：《越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本丛书名为“越文化通论”，就是试图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做一些新的探索。

本通论将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原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建立文化地理学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框架，综合利用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种方法，从纵横两个角度全面揭示越文化的历史演变真相和丰富内涵，并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分析越文化的基本精神，论述越文化和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指明越文化精华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特殊价值。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研究成果，这套论著要在各卷次的专题探讨上保持前沿性，体现独特性，拓展越文化的研究领域，争取在越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越文化的发展演变、越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地特有的经济思想和行为模式、越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特征、越地学术思想与学术流派、越地文学艺术成就、越地方言和民俗等一系列方面有较大的收获，力图让此项研究成果成为越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块基石，通过此次探索为今后越文化的研究找到新的起点。与此同时，本通论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其他地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一种模式以及一些有益的经验，甚或进而为国家整体文化的发展提供某种启示。

由于选题的内容部分是有交叉的，难免有些重叠；又由于作者认识上的差异，每部书的观点和看法不一定全然一致。我想这样也许有它的好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互相参校，生发出自己的看法。

越文化是一块沃土，我们希望，为了越文化研究的繁荣，为了学术事业的不断创新，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章 越地民俗文化综论 / 1

- 一、乡土的形成:越地与越人 / 3
- 二、历史的形象:起源与演变 / 14

### 第二章 越地物质生产民俗 / 21

- 一、农业和渔业民俗 / 22
- 二、工匠和交通民俗 / 39
- 三、商业民俗 / 47

### 第三章 越地社会生活民俗 / 50

- 一、越地会馆民俗 / 50
- 二、岁时节日民俗 / 55
- 三、越地生活民俗 / 70

### 第四章 越地民俗信仰 / 80

- 一、越地民俗信仰的形成与主要特征 / 81
- 二、越地民俗信仰与稻作农业 / 91
- 三、越地民间俗神 / 101

### 第五章 越地口传文学 / 112

- 一、徐文长的传说 / 112
- 二、绍兴师爷的传说 / 121
- 三、越地歌谣 / 127
- 四、越地谚语 / 141



## 第六章 越地民间曲艺 / 152

- 一、越地民间曲艺和民间文化 / 154
- 二、越地早期民间曲艺绍兴乱弹的民俗功能 / 163
- 三、新昌调腔 / 173

## 第七章 越地方言文化 / 182

- 一、越地方言的史层结构 / 182
- 二、越地方言的语言特色 / 187
- 三、越地俗语及其文化蕴涵 / 193

## 第八章 堕民与越地民俗文化 / 212

- 一、堕民在越地礼仪民俗中的执业活动 / 212
- 二、堕民“走节” / 222
- 三、民俗生活中的堕民演出活动 / 228
- 四、堕民的信仰与习俗 / 235
- 五、堕民的礼俗和语言习俗 / 245

## 附录 / 247

## 主要参考文献 / 264



## 第一章 越地民俗文化综论

英国的约翰·伯格说过：“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的问题。”<sup>①</sup>这即是我们追寻越地文化传统的原因。

越地民俗是越文化显示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越地历史传承的载体之一。

秦汉以降，随着人口的多次大规模迁移以及政治社会的统一、经济文化的融合，越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部族已经不复存在。尤其在主流的精英的文化层面，大一统的中华民族随着朝代的更替、社会的演进以及中央集权制度的高度发展越来越呈现出文化的同一性，越地社会又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边远蛮荒之地，逐渐向统一中国的重心区域位移，独立的文化系统无论从内涵还是表象都丧失几近，最终仅作为特定地域的文化而显示出自己的

<sup>①</sup> 引自陈丹青：《退步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特色。这不仅是越文化,也是所有地域性文化走过的普遍路径。

正如葛剑雄指出的那样,数千年来,地域文化的个性仍然以民间化的方式存在着,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以“节庆、饮食、婚丧嫁娶、方言、宗教和民间信仰”<sup>①</sup>等形式为每一个地域之“民”所习得、继承和拥有。因此,越地民俗文化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从更深层次上把握越文化的个性特征,追寻越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原始内涵,从而让现代的越地能有机会“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

钟敬文先生曾经在1990年代提出,民族文化具有上中下三个层次,上层是主流的文化,由统治阶级创造和享用的文化;中层是市民文化;下层是民间文化,由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sup>②</sup>作为民间的一种文化形态,民俗文化在地域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处于底层,以物质或非物质的形态存在,其与处于上层的主流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区别,同时两者之间又有联系。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从基层生长出来的上一层文化,不仅在文化的表现与保存的方式上与民间文化有所区别,在近百年来,已经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和改变。因此,在越地民俗文化的研究中,我们也注意到了其与主流文化的诸多联系,两者共同构成了当下作为地域文化——越文化的整体。

民俗,作为民众日常的风俗习惯,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包含了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民俗事件,以及由此产生和表现出的多种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民俗的中心是“人”,所以我们在研究越地民俗的过程中,必然要梳理越人的产生与演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纵向上有着比较大的变化,并决定了民俗的发展和演变。但在这种决定因素中,我们不得不重视地理环境的变化,尽管“地理环境决定论”并非民俗学界的共识,但自然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限制和规定作用一直是被普遍接受的。更何况,越地的地理环境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经历了多次的巨变,其中有自然界的变化也有人力的影响,这些变化都直接改变了越地社会的发展走向。

<sup>①</sup> 葛剑雄:《谈地域文化》,王建华主编《浙学、秋瑾、越地师爷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sup>②</sup> 参见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页。

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和“德范”<sup>①</sup>而具有传承性的特点,但随着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发展还具有变异性。更重要的是,作为民俗事象的研究,不仅仅只停留在“历史的遗留物”上,从传统的历史的角度研究民俗,更要从当下的现实的角度去解析民俗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并寻找与传统的共鸣与沟通。所以我们的研究既要注重历史的资料的梳理,更有关关注传统民俗在当代的状态。

另外,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试图把研究对象扩大到对“事件”的探索,民俗是生活的一部分,“出自个人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作的努力”<sup>②</sup>,是一个整体性的事件,因此我们需要结合民众的生活进行动态的观照。越地民俗不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古旧的个案,而是生动的生活场景。

### 一、乡土的形成:越地与越人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sup>③</sup>乡土社会是民俗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地域文化显示个性的根本原因。

乡土的意义首先是地理概念上的特定区域,其次是一定地域上的族群,最后是文化概念上的特定生活模式。乡土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地域族群的产生时期开始考察,在纵向上不断演变,这是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结果。越地作为乡土意义上的形成时期,应当追溯到越人的产生时期的地理和社会环境。越地最早的古人类,目前发现的是距今一万一年左右的“小黄山”遗址,尽管我们还没有证据表明“小黄山”的古人类与“河姆渡”人之间的联系,但他们在人类的进化上确实存在着递进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延续性,这是越人产生的最早阶段,也是我们追溯越地自然环境变化、社会变迁、越人由来的起点。

① 萨姆纳认为德范是流行于一个社会中的处世方式,这些方式与存在于社会中的过好生活的标准、信念、观念和律令——他们与这些精神因素有发生学上的联系——结合在一起,满足人的需要和愿望。

② 《萨姆纳论民俗》,引自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4 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 （一）越地的自然环境

越地的范围一直多有争议,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多有变化。《史记·货殖列传》说:“浙江南则越”,王充在《论衡》中说:“余暨以南属越,钱塘以北属吴,钱塘之江,两国界也”,“余暨”即今萧山。徐渭在《半禅庵记》中说:“由吴达越必经钱塘,江心之际,吴越分矣。”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越地,是以今绍兴为中心的宁绍平原地区,但是在历史的论述上也有变化,史前时期一般是指整个宁绍平原,明清之前包括了绍兴府下属的“八府”,近代则更多地是指宁绍平原的绍兴地级行政区,包括越城区、绍兴县、上虞市、诸暨市、嵊州市和新昌县,核心区域是越城区和绍兴县。

这一地区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处中、北亚热带季风气候过渡地带,季风气候显著,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日照丰富,湿润温和。西、北临杭州湾和钱塘江。南部是连绵数十公里的会稽山丘陵,东西最宽约 50 公里,东南至西北最长约 100 公里,期间丘陵的分布和走向都较复杂,最高的山峰也足千米,主干部分有西南和东北两个走向,连接诸暨、嵊州等地。北部是山会平原,被钱塘江和曹娥江所夹,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河网密集,湖泊星罗棋布,自然条件极为优越。

文化人类学的代表人物雷蒙德·弗思认为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形成关系十分复杂,一方面环境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迫使人类接受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并为人们提供需要的生活和生产物质;但另一方面,人类也并非消极地生活在环境之中,而是改变环境的积极因素。

越地的自然环境自有人类活动开始发生了多次根本性的改变,这其中既有自然的力量——海进的影响,也有马臻修鉴湖这样伟大的人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越人既接受了自然的约束,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着自然,并且创造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越地民俗即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成和发展,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实现着传承和变异,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地域个性。

我们可以把越地自然环境的变化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史前平原时期,包含了“小黄山”文明和“河姆渡”文明两个阶段,在地理上表现的特征是多次的海侵和海退。专家考证中国东部沿海曾发生三次大的海侵和海退,即星轮虫(asterorotalia)、假轮虫

(pseudorotalia)、卷转虫(ammonia)海侵。第一次星轮虫海侵发生于距今10万年以前。第二次是假轮虫海侵,发生于距今4万余年前,海退则发生于距今2.5万年前。此时的整个宁绍平原是一片广大的平原,东接今舟山群岛。第三次卷转虫海侵发轫于1.2万年前后,到距今7000—6000年,今宁绍平原完全被淹没。三次海侵和海退造成了地理环境的大规模变化,直接影响了“小黄山”古人和“河姆渡”人的生活,造成了越人的流散,从根本上改变了早期越人的生存方式。

一般认为,“人类从更新世末期以来已经在这个地区繁衍生息”<sup>①</sup>,距今1万余年。卷转虫海侵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历时5000余年,远古的越人就在这个时期生活在现在的宁绍平原,“这是一片宽广的平原,具有背山面海的形势,距南面不远,就有山林之饶,而平原北缘濒海,又有鱼盐之利。平原上气候暖热,水土资源丰富,于越部落的祖先,是在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繁衍发展起来的”<sup>②</sup>。这是越人最早生活的地理环境,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其时的自然环境比现代的越地环境还要优越得多,不仅平原面积广阔得多,自然的植被,物产资源也更为丰富。共同的一点是都处于背山面海的大环境之中,这也是越地自然环境历万年而不变的基本面貌。

第二个阶段是山居海处时期。卷转虫海侵以后,越人生活的自然环境逐渐恶化,不仅陆地被大片地淹没,土地面积变小,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没有海塘的阻隔,海水直接随着潮汐的变化倒灌入内陆地区,造成土壤的盐渍化,河姆渡时期已经成熟的水稻种植等农业生活被迫逐渐萎缩,以至于无地可耕种。生活环境恶化以后,越人开始了大规模的迁移,部分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内越和外越,外越流散较广,甚至东及日本,南入广西,北渡钱塘奠定了吴国发展的基础;内越进入了会稽山为中心的浙东山区,“人民山居”,“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sup>③</sup>

河姆渡人生活的平原已经成为一片浅海,海岛星罗棋布,此时的越人背依着群山,在山麓的冲积扇耕种,但广袤的大海也成为越人获取生活资源的重要途径,同时又与居于海岛的外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山居海处是此时越人最重要的生活环境,一直到海退,越人的生活环境才有了

① 陈桥驿:《吴越文化论丛·越族的发展与流散》,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0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③ 赵晔:《吴越春秋》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重要的变化。

第三个阶段是前鉴湖时期。大约在 4000 年前,海水从宁绍平原退去,海侵之前富饶的平原重新露出水面,但自然环境已经大为改变,越人面对的是一片泥泞的沼泽,海岸并不遥远,海水每天两度倒灌入来,土地盐碱化,基本不能利用。

公元前五世纪之初(前 496),越族中一位雄才大略的部落首领——句践即位,他目睹山地资源的贫乏,充分认识到制约越族发展的地理因素,因此下决心要走出会稽山,重新在宁绍平原发展壮大。公元前 490 年,句践在今绍兴府山边上修筑了小城,作为全族政治的中心和军事的堡垒,而后又利用平原上九座高耸的丘陵修筑了大城作为经济中心和生产基地。从此,越人正式从山地走了出来,重新在祖辈创造了繁荣历史的平原上建设家园。这个时期的越地还是一块洪涝灾害多发的贫瘠之地,不仅要承受从会稽、四明山区下来的山洪,海水的倒流也时时成灾。所以管仲的一句话非常贴切:“越之水重浊而洿,故其民愚极而垢。”“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成为越人的基本生活模式。

第四个阶段是鉴湖时期。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会稽郡的太守马臻主持修筑鉴湖湖堤,最终形成了围绕会稽郡城面积达到二百多平方公里的鉴湖,彻底改变了越地的地理环境,使稽北平原的广大地区成为灌溉便利的农业区,湖堤内的会稽郡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奠定了现代越地区的基本地理环境。

东汉以后,越地又开始在今杭州湾边上修筑海塘,使稽北平原成为淡水区;唐以后,由于湖水水位的下降和大面积的围湖垦田,使鉴湖在南宋年间逐渐湮废,但越地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保持了近千年来的基本稳定。

## (二)越人的由来与演变

古越人的产生,还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依据和明确的结论,从考古发现看,浙江省境内最早的古人类是“建德人”,从对发现的一枚牙齿测定距今 10 万年,而宁绍平原现存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是位于嵊州甘霖镇上杜村的小黄山遗址,大约距今 10000—8000 年之间。随后的是同处钱塘江南岸的跨湖桥文化遗址,距今 8000—7000 年间。众所周知的河姆渡人大约在